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

上卷

主编

宁树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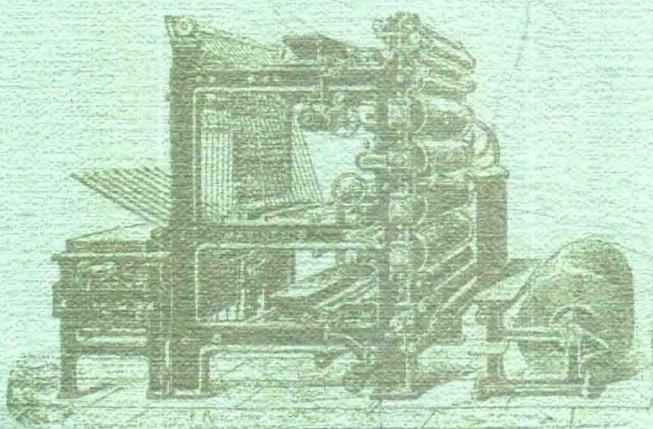
副主编

姚福申

秦绍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

上卷

主 编
副主编

宁树藩
姚福申

秦绍德

序

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立项、牵头、主编，姚福申、秦绍德等四十位学者通力襄助和协作完成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经过 26 年的努力，终于杀青问世。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的出版，值得欢迎，值得重视，值得祝贺。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从地方新闻史开始的。最早问世的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以及胡道静有关上海新闻史的系列著作，蔡寄鸥有关武汉新闻史的专著等，都属于地方新闻史研究的范围。20世纪 80 至 90 年代，各省市纷纷修撰地方志，其中就有不少地方新闻史的内容，有的还设立了专“志”，或专门的章节。但一部贯穿古今，纵贯百代，包罗六合，以研究和比较全国各地区新闻史发展历史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的专著，则似乎还不曾有过。这说明中国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是不平衡的，也说明这方面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比较研究，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现在，这样一部以《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命名的，以研究和比较全国各地区新闻史发展历史为主要内容的鸿篇巨构，正呈现在读者面前。她不仅对全国省市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历史的概括、勾画、描述和分析，而且在书的最后部分为读者提供了 15 项包括“调查表”“分类统计”“报刊名录”等在内的附录，以方便学者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真是功莫大焉，善莫大焉。主编和作者们的创意，他们的辛劳和奉献是

十分值得称赞的。

我和宁树藩教授相知相识逾 60 年。深知他是一位德、才、识兼备的新闻史学者。他是学外语出身的，英文很好，这使得他在治学上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眼光。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了求学，曾经随着流亡师生步行从浙江经江西、湖南走到广东的坪石，练出了一双能够长途跋涉和吃得起苦的铁脚板，也练就了一身能够适应各种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本领。到复旦任教后，他由教政治课、教党史转为教新闻史，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文史基础。50 年代中期以后，他专攻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成绩斐然，成为一代宗师。我和他虽然不在一个学校，没有在一起参加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的各项“运动”，但始终相濡以沫，时时存问，并未相忘于江湖。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又和他有了多次合作和切磋的机会。他是我十分尊敬的长者。由他主持编写的这部《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是他经营了 20 多年的传世之作。它的出版，将是对不久前逝世的这位长者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参与这部专著编写工作的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班子，既有渊博多识的硕学鸿儒，也有才情敏给的青年俊彦。而姚福申、秦绍德两位学者则为这部书的最后完成和顺利出版作出了重大贡献。没有他们的努力和辛勤付出，这部书不可能这么快收官和出版。他们的业绩，同样值得感念。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经过几十位作者 20 多年的努力终于杀青问世，我乐观厥成，爰为之序。

才 | 草 | 章

2016 年 6 月 7 日于北京宜园

前 言

我们的祖国——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多样。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帝国的瓦解和军阀割据，接连不断抵御外侮的抗战和内战，使得不平衡进一步加重。

这种不平衡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在全国各地区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不仅诞生年代有先后，发展规模有大小，而且运行轨迹也不同，形态特点更是千姿百态。若以为中国新闻史只是几个发达中心城市新闻事业的兴衰演变，只是若干位著名记者、报人的奋斗历史，那就错了，太不全面了。一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是包含全国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部历史。既有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也有落后、边缘地区的；既有先行繁荣的，也有后来崛起的；既有汉族的，也有少数民族的。本书展现了全国各地区、各省份近现代新闻事业沿革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弥补了以往中国新闻史著作的不足和缺漏。

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差异性，是由各地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制约决定的。虽然从总体上看，经济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但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政治却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譬如抗日战争时期三个不同的区域——沦陷区、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就明显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作为政治的最高形式——战争，往往决定着各地区新闻

事业的命运,它可以风扫落叶般地摧毁新闻事业,也可以带来重建和勃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全国政令统一和计划经济体制,各地新闻事业的差异性在缩小,同质化在扩大。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各地新闻事业“井喷”式发展,创新争先,活力空前增强,又形成了差异性竞争的局面。

有差异,就能比较。有比较,方能接近对规律的认识。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背后存在着深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性。地区发展的差异是表象,决定地区发展差异的因素却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有某些规律可循。比较,是一种可资认识规律的方法。在其他学科领域,如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比较研究已展开多年,较为成熟。而在新闻史学领域,尤其是中国新闻史领域,则刚刚开始,还在摸索阶段。本书也是一种尝试,旨在通过比较地区内各省份、全国各地在同一时段内的发展差异性和相似性,探索形成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原因,从而归纳总结我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若干规律性思考。与以往新闻史著作不同之处在于,本书更着眼于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思考。

鉴于研究和叙述的方便,本书内容分三个部分:即“总论”“地区评述”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事业发展概要”(以下简称“概要”)。

“概要”是本书的基础部分,文字数量也最多,系统地叙述各省、市、自治区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比较本省(市、自治区)内不同地区的差异,新闻出版中心的形成,以及和邻近省份的区别。须说明的是,海南省因建制不久,未独立成篇,有关内容写入广东省。

“总论述”是本书之纲,也是最着力的部分。这部分以历史为线索(划分为十一个时期),以地区为落脚点(这里所说的地区,一般会突破行政区划的概念),以全国为视野,阐述新闻事业发展的地区运行轨迹及政治大变动所造成的地区流向;阐述全国报刊重要基地的出现,新闻出版中心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历史变化,地区中心的形成及辐射情况;阐述报刊多样化发展中的分流与汇合;阐述军阀割据、国民党地方势力对地区新闻事业的影响;阐述广播电视发展中的网络布局、技术进步的特点以及对各地的影响;阐述中西文

化碰撞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新闻事业的不同影响，等等。

“地区评述”有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七篇。地区大致按曾经有过的行政大区与历史习惯划分，台湾列入华东，港、澳列入华南。“地区评述”介于“概要”和“总论”之间，是联系二者的纽带。“地区评述”大致勾画出该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特点，阐述地区新闻出版中心的出现及历史变迁，以及地区内各省的比较。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近代报刊诞生起，截至 20 世纪末。个别内容延伸至本世纪初。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总论：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地区轨迹

第一章 外报全面垄断时期(1822—1894)	3
第二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8)	13
第三章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1899—1911)	20
第四章 民国成立初期(1912—1919)	29
第五章 “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9—1927)	43
第六章 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	59
第七章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88
第八章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117
第九章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奠基时期(1949.10—1957.春)	169
第十章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时期(1957—1978)	191
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时期(1978—2000)	216

第二部分 东北地区

第一章	东北地区新闻事业评述	257
一、东北报业在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中产生与发展		
(1899—1911)		257
二、军阀割据时期的东北报业(1912—1931)		262
三、伪满时期新闻统制和三次新闻整顿(1932—1945.8)		266
四、解放战争时期随军进退的东北报业		
(1945.9—1948.11)		270
五、解放后东北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特色(1948.11—2000)		274
第二章	黑龙江新闻事业发展概要	279
一、黑龙江古代的新闻传播		279
二、黑龙江早期的外文报刊		281
三、黑龙江的近代新闻事业		284
四、“五四运动”后的黑龙江新闻事业		288
五、20世纪20年代黑龙江的外文报刊		293
六、黑龙江沦陷时期的报刊		297
七、抗日联军在黑龙江的报刊		300
八、解放战争时期的黑龙江新闻事业		304
九、新中国建立后黑龙江的新闻事业		308
十、新时期的黑龙江新闻事业		312
第三章	吉林新闻事业发展概要	315
一、清末吉林报业的产生与发展		315
二、民国初年吉林省的报纸		321
三、沦陷时期吉林省的报纸		323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吉林报业		327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林的新闻事业		330
第四章	辽宁新闻事业发展概要	333

一、辛亥革命前的辽宁报业	333
二、奉系军阀统治的二十年	338
三、伪满时期的辽宁新闻界	345
四、从抗战胜利到新建辽宁省	348
五、辽宁新闻事业在曲折中前进	351

第三部分 华北地区

第一章 华北地区新闻事业评述.....	357
一、初创时期(1900年之前)	357
二、20世纪初的大发展(1900—1911).....	362
三、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1912—1928)	366
四、南京政府控制时期(1928—1937)	371
五、全面抗战八年间(1937—1945)	375
六、为全国解放作贡献(1945—1949)	380
七、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1999)	384
第二章 北京新闻事业发展概要.....	390
一、北京近代报刊姗姗来迟	390
二、维新派报刊在北京昙花一现	391
三、各派政治力量纷纷在首都办报	393
四、民初北京新闻业的斗争与发展	396
五、新闻事业在“五四”至北伐时期的变化	402
六、政治中心南移后的北平新闻事业	406
七、北平沦陷时期的新闻界概况	411
八、从胜利到解放北平时期新闻界的剧变	417
九、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新闻业再度辉煌	421
第三章 天津新闻事业发展概要.....	429
一、天津近代报刊的初创时期	429
二、殖民势力的深入与近代报业的发展	432

三、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天津报业	436
四、新闻事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发展	441
五、敌伪时期的天津新闻事业	445
六、解放战争时期的天津新闻事业	448
七、新闻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451
第四章 河北新闻事业发展概要.....	456
一、河北新闻事业的起源与清代“京报”	456
二、晚清近代报刊在河北的发展	458
三、民国成立到北伐时期的河北报业	459
四、河北新闻事业在十年内战中的发展	462
五、抗战时期河北新闻事业的艰难历程	466
六、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的新闻事业	471
七、河北新闻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474
第五章 山西新闻事业发展概要.....	478
一、山西报业蹒跚起步	478
二、晚清时期的并州报界	480
三、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山西新闻事业	484
四、抗战时期的山西报业	489
五、山西新闻事业迎来沧桑巨变	496
六、解放后山西新闻事业的发展	500
第六章 内蒙古新闻事业发展概要.....	505
一、清末民初	505
二、在“五四”和大革命潮流中	508
三、十年内战时期	512
四、抗战前后	516
五、新中国成立以后	522

第一部分

总论：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 发展的地区轨迹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家，世界各国实所少见。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由此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即地区的差异性（稍大点的国家也有，但中国更明显些）。它表现于很多方面，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情况错综复杂。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探讨，将会大大拓宽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领域，活跃研究思路，深化研究层次，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色和运行规律。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新闻学界通力合作。近年来，地方新闻志和新闻史的编写工作，热潮迭起，成果累累，为这项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本书是一带基础性的尝试之作，所论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侧重研究报业发展的地区走向、新闻媒介在全国分布的地区格局、全国和地区报刊出版中心的形成和变动、报业区域特色之呈现等问题。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状态对各地报业的不同影响，本文自当涉及，但不作系统论述。

第一章

外报全面垄断期间(1822—1894)

至 19 世纪初,近代型报刊在欧美一些主要国家差不多已有一百数十年至二百年的历史了。它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出了多彩多姿的表演。一股影响深远的改革潮流,正在火热的竞争中悄然兴起,真是热闹非凡,引人神往!

这时,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还没有诞生过一份这种近代型报刊。我们看到的只是发源于唐代的古代型《京报》。它不断携带着皇朝信息,自京都辐射至全国。中国的封建社会,自身还不能培育出近代报刊,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当别人已经把它创造出来并置于我们的大门前时,不仅民间无人学办,就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清廷统治者,也全然无意效法以强化自己的传播系统。目光远大,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在和英国人的斗争中,也只是懂得译报(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还没有考虑过办报,表明中国实在是太落后了。

这就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即近代报刊起初是由西方殖民主义者从外部移植到中国境内的,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约 70 多年)外报在中国报界处于垄断地位。在此期间,考察中国境内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状况,就必须考察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在中国活动的状况作为总的出发点。

外报是在 19 世纪 20 年代由南部的澳门和广州开始进入我国的。澳门出版近代报刊最早,1822 年 9 月创刊的葡文《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是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报刊。澳门所出的报刊数量也最多,至1839年计出有葡文7种,英文1种,中英文合刊1种,1839年从广州迁来英文报刊3种,可说是相当繁荣了。不过,外报在华的发展,澳门并不担当主要角色。当时的澳门已是葡萄牙统治多年的地区,葡国并无以此为基地对华大举扩张的战略意图。这里所办的大多为葡文报刊,其内容所涉也大多为该国自身事务,与中国关联甚少。它所起的特殊作用,是作为英美人士在广州办报的联络站和回旋地。英美商人和传教士经常为广州办报事务奔走于粤澳之间;在中英关系紧张之时,他们就把广州的报纸迁到澳门以避风头。

主要角色是广州。这里的全部报刊都是为推动外国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而运转的。着力经营的是英文报刊,至1839年计出有商业报纸5种(英商4种、美商1种),杂志2种。其中有1827年创办、中国第一家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有提倡自由贸易、重视对华报道的《广州周报》,有由美国传教士主办、出版近20年负有盛名的《中国丛报》。其事业之隆,影响之巨,澳门望尘莫及。外国传教士还在这里办有中文报刊两种,其中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当时清廷禁止在广州传教和出版中文报刊,传教士使用种种手段不予理睬,但毕竟障碍较多,难以打开局面。上述两种中文报刊合起来只出了两年,便匆匆结束。

英美传教士为什么不就近选择澳门作为他们的报刊出版基地?当然,这里紧邻广州,又可逃避清政府的干扰,应是理想地区。可是英美传教士所奉行的基督教(新教)和澳门葡萄牙当局所支持的天主教,形同水火,势不相容。当“伦敦布道会”的米怜1813年初次来华甫到澳门时,便被当地政府限令24小时内离境。1833年澳门当局又查封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设在该地的印刷厂,迫使马氏所办英文周刊《澳门杂文编》停刊。可见,澳门并非他们办报的理想场所。他们之所以把出版基地选在南洋的马六甲、新加坡等地,是经过审慎思考的。

1839年秋由于中英关系紧张,广州的中英文报刊或停或迁,它再次成为无报城市。而澳门除原有两种葡文报纸外,又从广州迁来3种赫赫有名的英文报刊,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就是澳门上述特殊作用的发挥。鸦片战争的大炮,从东南沿海打开了外报进入中国大陆的通道。《南京条约》

为新的出版地点做好了安排。它们由广州向福州、宁波、上海等新开放的通商城市伸展。自 40 年代初至 1860 年,广州出了英文报刊 3 种,葡文 1 种;福州出了中、英文报刊各 1 种;宁波出中文 1 种;上海出英文 5 种,中文 1 种。

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报业的兴起。在鸦片战争前,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与报纸无缘。可是到了 1860 年,这里先后涌现了英文报刊 11 种,中文 4 种,葡文 2 种,其数量超过包括上海在内的各通商城市所出之总和,而且有不少报纸,如英商办的英文《中国之友》报、《香港纪录报》和《德臣报》,都是影响一时的著名报纸,其中《德臣报》直到 1974 年才停刊,成为在华历史最长的一家报纸。香港报业为何出现如此异乎寻常的发展势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后香港在中外(首为英国)贸易中所处的特别重要地位,对办报提出了迫切需求,而英国政府在这里所建立的直接统治和快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又为办报创造了比中国任何城市更为方便的条件^①。历史为香港的报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上海在开埠 7 年后(1850 年)开始办报,比香港迟了 9 年,但较其他各市为早,其报刊数量也为其他各市之冠。《北华捷报》一创刊就十分活跃,摆出与香港一争长短的架势。上海报刊发展的势头强劲,不同凡响。

广州和澳门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广州原为外报最繁盛、最活跃的城市,是不可代替的据点。后来变了,战前一些著名的大报,1839 年迁走后再迁返的只《中国丛报》一家。该报失去当年的生气,不久也停办。新办的一家英文一家葡文报纸,表现本就平平,一年后闭馆。到了 1859 年全市一份报刊也没有了。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广州紧邻香港,当时最需要英文商业报纸,可由香港包揽。而两次鸦片战争中,广州所受侵害最为严重,市民反对外来势力的情绪也最强烈。外国人在这里出版报刊,就多了一层顾虑。更重要的原因,是广州原为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现在中外贸易北移的趋向日渐明显,办报的基本需求削弱了。

澳门,如前所述,它在中国报业上的地位,是由它所起的一种特殊作用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版,第 289 页。

造成的。这种特殊作用就是作为英美在华办报活动的联络点和回旋地。在香港初建百务待举,战局仍不稳定之际,这种特殊作用曾有所发挥。例如,《香港公报》(1841)和香港《中国之友》(1842),都是先在澳门出了创刊号后才回香港出版的。一旦香港条件完善,这一特殊作用便很快消失了。所出3种葡文报刊,所涉大多为与葡国相关的事务,自成系统。澳门的报业未再引起中国社会注意。

和战前一样,办报的仍然是商人和传教士两种人,也仍然是商人办英文报纸、传教士办中文期刊这种基本模式。但这期间出现了一重要倾向,即商人在中外商务急剧发展的推动下大办报纸。自1841年至1860年一共出了约20种英文报纸、1种中文报纸。而传教士则办报的积极性不高,行动滞缓。鸦片战争后他们纷纷来华,至1860年基督教传教士已达百余人。他们将原设在南洋诸地的印刷设备也迁来香港和上海,可是他们当时忙于筹建教堂和从事笼络人心的办学与医疗事业,宣传上又侧重于印刷一些宗教小册子和科技书本,对办报不予重视。至1860年,他们一共只出版了3种期刊,即香港的《遐迩贯珍》、宁波的《中外新报》和上海的《六合丛谈》^①。这3种期刊的出版时间合计不过10年。这种商业报刊与传教士报刊的严重失衡的状况,又造成了英文报刊与中文报刊的巨大差距。从数量论,英文报刊与中文报刊的比例是6:1,如果再考虑到英文报刊比中文报刊早出12年,而前者又都是报纸(其中不少是日报),后者大多为期刊,其差距之大就难以计算了。当时的报坛,可以说是英文报纸的世界。这一状况表明,外报还来不及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中国读者,并将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这是外报在华发展的早期性表现。这种早期性和外报地区发展的初创阶段是相适应的。

使在华外报地区发展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人,严重不满《南京条约》的限定,叫嚷以战争扩张他们的势力,在华的英文报纸纷起鼓噪。外国势力及其报刊积极要求向中国大陆推

^① 据1843年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记载,在1843年初,传教士曾出过一份名为《千里镜》的中文月刊,因出版地未明,故暂不计人。